

# 爱情的红丝线

文/庐山

匡庐水

一个城市最为珍贵的财富便是历史,历史就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并称为中国四大爱情故事(传说)。除“孟姜女哭长城”外,其他三个故事均在我市有迹可寻,具体地说,镇江是当之无愧的故事发源地。

天仙配——槐荫村  
白蛇传——金山寺  
梁山伯与祝英台——华山畿

这一个个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如此,在我们这块具有3000年历史的土地上,城市的每个角落无处不留下爱情的印痕:刘备招亲甘露寺、绝代名姬杜秋娘、梁红玉与韩世忠……等等等等。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鲜明标志和文明传承。

现在我们不妨以时间为线索来梳理一下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慨叹的精彩。

## 公元一世纪

发生在董永和七仙女之间的“天仙配”,应该归咎于神话类传说。最早见诸于文字系汉刘向的《孝子图传赞》,后在东晋干宝《搜神记》、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图》中均有记载:“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途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荫会所,遂辞永而去。”不难看出,董永是在“卖身葬父”后“途遇一妇”而非“七仙女下凡”。人们歌颂和赞佩的是董永的品格。试

想,如此孝道的青年能不给他一个仙女般的妻子么?

## 公元三世纪

三国时期,孙权和刘备为了抗衡势力强大的曹操,于是有了刘备与孙尚香的政治联姻。此举的意义在于,刘备得以据荆州向四川发展,孙权则因为刘备作为前敌屏障而专意经营吴地。经历了“赤壁之战”的曹操此时亦已大丧元气,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应运而生。因此,刘备招亲甘露寺的初衷本与爱情无关。其后孙权又借故将妹妹尚香接回吴国。倘若没有关羽失荆州走麦城,刘备起兵讨吴托孤白帝城的插曲,刘备与孙尚香必然是劳燕分飞各一方。惊闻刘备病故噩耗的孙尚香义无反顾地从甘露寺纵身一跃跳进长江,从而给这场白开水般的爱情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 公元五世纪

“华山畿,君既为依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依开。”这是乐府《吴声歌曲》《华山畿》25首的第一首,说的是南朝宋时期镇江一位书生因相思华山畿的女子而亡故,那女子得知后便情深意长地唱了这支曲子,意译为:华山畿啊,我的郎君既然为我献出了生命,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郎君啊,你如果可怜我,请打开棺木吧。神奇的是在女子凄切的歌声中棺木竟徐徐开启,女子纵身入棺二人合葬在一起,表达了“生不能同衾死同穴”的纯美爱情。其合葬处便是传说至今的华山畿的“神女冢”。

## 公元九世纪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这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位女诗人、镇江才女杜秋娘的传世之作。公元807年镇海节度使(治所镇江)李錡兵变被俘,杜秋娘同时被作为战利品押送京城。秋娘以其姿色与才华深得唐宪宗宠幸。于是大唐帝国的中兴皇帝与才貌双全的江湖艺伎演绎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动人乐章。

## 公元十二世纪

韩世忠为何娶妓女出身的梁红玉,史上已无记载。但仅凭“冒着流矢亲执桴鼓”这一点,便足以证明梁红玉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抗金兵,困金兀术于黄天荡长达48天之久,让这对并肩作战的夫妻感情上得到极大的升华。战火中的爱情白璧无瑕。甚至在金兀术连夜掘河三十里狼狈逃窜后,一身正气的梁红玉非但不替丈夫说项,反而上书朝廷弹劾丈夫“失机纵敌”,请求给以重罚。朝野上下无不为其的胆识和胸襟而动容!

我们还能列举出很多很多的本土爱情。这是一块产生爱情的土地。

多年以前,我们曾不止一次呼吁过用爱情的红丝线将西起槐荫村东至华山畿有机地联系起来,金山、西津渡、北固山、焦山尽在其中,从而向世人张扬起爱情之都的旗帜。遗憾的是一切努力无不泥牛入海,反倒是杭州将白娘子和许仙视若珍宝,率先亮出了爱情之都的招牌。

如今,每每读到柳永的《雨霖铃》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位怀才不遇仕途不顺的一代大师死后的凄凉。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词中“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楚天”,指的便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我想,柳永惜别京城后是直奔镇江而来的。

有道是,有井水处便有柳永歌。各地青楼均以吟唱柳词为时尚,镇江自也不例外。

贫困潦倒的柳永先生病歿于镇江,是镇江的青楼女子仗义出手,含着泪水凑钱送了柳永先生最后一程。

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真正的爱情体现的是真、善、美,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尊重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无论是出于观光旅游的角度还是触摸历史的目的,一个产生大爱的城市无疑都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地方。

# 我自横刀向天笑

文/习斌

稗海习得

战国时,群雄纷争,礼乐分崩,时代呼唤变革。这场变革的序幕,最初是由魏国李悝变法拉开的。但如今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

吴起和商鞅都曾在魏国呆过,但高擎变法大旗的魏国,却没有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吴起转而投奔楚国,在楚悼王手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商鞅转而来到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实施改革。举凡改革,妨害的总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变法遭来王孙权贵的嫉恨,在所难免。楚悼王、秦孝公堪称是吴起、商鞅的知音,正是他们坚持变革,才使新法能够推行,国力日渐强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楚悼王、秦孝公殡天之后,失去了庇护,迎接吴起、商鞅的便只能是血腥的结局了。

吴起是睿智的。当积忿已久的一帮贵族高举弓弩欲射死他时,他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身上。按照楚国的法令,损伤君主乃是重罪。如果贵族们射死吴起,必殃及悼王的尸体。但追杀吴起的楚国贵族们已是丧心病狂,他们浑然不顾悼王的尸体,依旧射杀了吴起。吴起死了,贵族们也付出了代价,因射伤悼王尸体而被继位的新君诛灭的宗族,达到七十多家。

关于商鞅之死,正史记载略

有不同。一说孝公死后,商鞅面对朝廷的追捕,发动兵变,兵败被杀,尸身运回咸阳后,继位的秦惠王下令车裂其尸。另一种说法是,商鞅兵变失败后,被秦军擒获,押赴咸阳,车裂而死。历史真相如何,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我宁愿相信后者。惟其如此,商君之死才显得更悲怆,更凄凉。

商鞅虽然死了,但幸运的是,商鞅推行的新法,却没有在秦国废除。就这一点来说,商鞅比吴起要幸运,但也比吴起更令人同情。如果不是商鞅变法,怎么会有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作为千古功臣,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不令人寒心?

俗话说“不破不立”。要想破旧立新,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勇气,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楚悼王和秦孝公的支持,吴起和商鞅便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是无从施展。然而,当天时、地利不再,也许便注定了悲剧的上演。

改革图强者,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他们虽志存高远,但往往却要面对来自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和羁绊。这是他们的无奈之处。无能为力,无可改变。然而,他们改革图强的决心和魄力,却令人击节称叹。直面陈弊,百折不挠。

一个近乎冷血的事实,令我

们在沉思之余,久久歎歎。纵观古代历史,实施变法的政治家们,却几乎都陷入了飞来横祸的“怪圈”,或身前被诛,或死后抄家。是长期的墨守成规,让一切的变法图强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是长期的中庸之道,让所有的变法图强都显得那样的激进荒谬?还是那些陈弊背后原本就有着很多丑陋不堪的东西,一旦揭开遮羞布,便会触及很多人敏感的神经?岁月无痕,史书无言,个中的是非非,恐怕当得起“触目惊心”这四个字。

内阁首辅张居正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犹如夜幕中的一线曙光,给垂垂待毙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丝生机。生前极尽人臣之宠的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不仅新政被毁,哀荣尽废,而且家族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这是新政反对派的一次集中清算,也是长期生活在张居正阴影之下的万历皇帝压抑情绪的集中释放。张居正家产被查封,长子自尽,自己险遭开棺戮尸之辱。及至崇祯帝即位,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崇祯思及张居正,曾说:“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许此时的崇祯正在思考,如果张居正的新法能一直实施下去,大明王朝会不会是另一番气象?张居正的个人悲剧,又岂不是大明王朝的悲剧?同样令人扼腕的,还有光绪

帝实施的戊戌变法。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已到了亟须变法图强的生死存亡关头。然而,光绪帝满腔的救国热忱,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无情镇压。光绪帝从此被囚禁于瀛台,力主变革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是以生命的代价,为腐朽的清政府唱响了挽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这诗,惊天地泣鬼神,感染了多少华夏儿女!

凡事破有破的因缘,立有立的道理。举凡影响深远的变革,总是发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也许,变革者凭一己之力,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许,变革亦有追求完美不切实际之处,但我们理应向所有的变革者致敬,因为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瞭望者,先行者。他们的清醒和勇气,是混沌俗世里难得的强音!



商鞅像

多年以前,我们曾不止一次呼吁过用爱情的红丝线将西起槐荫村东至华山畿有机地联系起来,金山、西津渡、北固山、焦山尽在其中,从而向世人张扬起爱情之都的旗帜。遗憾的是一切努力无不泥牛入海,反倒是杭州将白娘子和许仙视若珍宝,率先亮出了爱情之都的招牌。

专栏 A12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